

第三卷

解读三千年史学经典
评析三千年史家精英

仓修良主编

中国史学
名著评介



K204
12
:3
2006

第三卷

仓修良主编

解读三千年史学经典
评析三千年史家精英

中国史学
名著评介





总目

第一卷

尚书
春秋与左传
国语
战国策
逸周书
世本
竹书纪年
山海经
越绝书
史记
列女传
汉书
东观汉记
汉纪
吴越春秋
风俗通义
三国志
后汉纪

后汉书
华阳国志
宋书
南齐书
魏书
水经注
十六国春秋
洛阳伽蓝记
高僧传
大唐创业起居注
梁书与陈书
北齐书
周书
隋书
晋书
南史与北史
大唐西域记
史通



贞观政要
通典
元和郡县图志

第二卷

唐会要
旧唐书与新唐书
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资治通鉴
通鉴外纪
唐鉴
东京梦华录
通志
续资治通鉴长编
容斋随笔
东都事略
三朝北盟会编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通鉴纪事本末
资治通鉴纲目
大金国志
文献通考
辽史
金史
宋史
蒙古秘史
元史
永乐大典
皇明资治通纪
弇山堂别集
藏书和续藏书

明实录
国榷
罪惟录
明季北略与明季南略
读通鉴论
明史纪事本末
读史方輿纪要
明儒学案
宋元学案
绎史
明史

第三卷

四库全书总目
十七史商榷
廿二史考异
廿二史劄记
续资治通鉴
文史通义
史姓韵编
元史本证
考信录
畴人传及其续编
圣武记
海国图志
蒙古游牧记
碑传集(附续、补、三编)
夷氛闻记
朔方备乘
小腆纪年附考
中西纪事
明通鉴



湘军志
 东华录
 新学伪经考
 日本国志
 元史译文证补
 宋史翼
 大同书
 中国古代史
 中国历史教科书
 历代舆地图
 清朝续文献通考
 蒙兀儿史记
 清史稿
 新元史
 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附《清代学术概论》)
 古史新证
 中国文化史

第四卷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清代通史
 史学要论
 古史辨
 史讳举例
 通鉴胡注表微
 中国制度史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卜辞通纂
 晚明史籍考

客家研究导论
 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
 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
 明清史论著集刊及续编
 中国南洋交通史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历史哲学教程
 秦汉史
 中国史纲(上古篇)
 春秋史
 中国通史简编
 中国近代史(上册)
 甲骨学商史论丛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柳如是别传
 中国政治思想史
 郑和
 岳飞传
 清史探微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中国思想通史
 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
 ——殷代奴隶制社会史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第五卷

中西交通史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及其续编、
 拾遗
 战国史
 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



- | | |
|--------------------|------------|
| 隋唐史 | 辛亥革命史 |
|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 洪业论学集 |
| 汉书新证 | 古史论集 |
| 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
制度 | 中国史探研 |
| 明清农村社会经济 |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
|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 穹庐集 |
| 清人文集别录 |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 |
| 中国文献学 | 长水集及其续编 |
| 河山集 | 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 |
| 朱元璋传 | 太平天国史 |
| 明代的军屯 | 中国古代社会 |
| 明史考证 | 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 |
| 魏晋南北朝史 | 中国史学史论集 |
| 周代社会辨析 | 马可波罗在中国 |
| | 中华远古史 |



目录

四库全书总目·····	黄爱平 (1)
十七史商榷·····	刘伯涵 (17)
廿二史考异·····	施 丁 (33)
廿二史劄记·····	王树民 (45)
续资治通鉴·····	周宝珠 (58)
文史通义·····	刘汉屏 (66)
史姓韵编·····	鲍永军 (87)
元史本证·····	鲍永军 (105)
考信录·····	陈其泰 (125)
畴人传及其续编·····	张文建 (139)
圣武记·····	袁英光 (146)
海国图志·····	吴 泽 (161)
蒙古游牧记·····	包文汉 (180)
碑传集(附续、补、三编)·····	张承宗 (188)
夷氛闻记·····	胡逢祥 (207)
朔方备乘·····	杨余练 (218)
小腆纪年附考·····	邬国义 (231)
中西纪事·····	周朝民 (244)
明通鉴·····	袁英光 (255)



湘军志·····	祁龙威 (275)
东华录·····	罗 明 高 翔 (286)
新学伪经考·····	汤志钧 (293)
日本国志·····	盛邦和 (303)
元史译文证补·····	陈得芝 (322)
宋史翼·····	张 勤 (329)
大同书·····	汤志钧 (339)
中国古代史·····	袁英光 (354)
中国历史教科书·····	袁英光 仲伟民 (372)
历代舆地图·····	李志庭 (389)
清朝续文献通考·····	高 翔 (399)
蒙兀儿史记·····	余大钧 (407)
清史稿·····	董守义 (421)
新元史·····	余大钧 (438)
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	叶振华 (457)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附《清代学术概论》)·····	胡逢祥 (475)
古史新证·····	谢维扬 (490)
中国文化史·····	张文建 (506)



四库全书总目

黄爱平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或简称《总目》)是在《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产生的一部目录著作。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由官府组织编纂的最后一部大型书目,它继承发扬了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在目录学以及文献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具有总结集成性质和里程碑意义的重要篇章;与此同时,它也适应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需要和传统学术的发展变化,鲜明地反映出18世纪知识界的思想观念和学术特征。

(一)

《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它著录书籍3461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总计10254种,172860卷,几乎囊括了清代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堪称传统文化的总汇,古代典籍的渊藪。

作为一种总汇群书的书籍形式,丛书在中国历史上起源很早。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南北朝时期南齐陆澄编《地理书》149卷,收《山海经》以下160家地理著作;其后梁任昉在此基础上,又增补84家,编成《地记》252卷。这可以说是最早的具有专门学科性质的地理类丛书,被后世学者称之为“丛书之祖”^①。但其时虽已具丛书之实,尚无丛书之名。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124,杂家类杂编之属案语,中华书局1981年影印本。



丛书的名称最早出现在唐代，始见于陆龟蒙的《笠泽丛书》。但该书有丛书之名，却无丛书之实，只是个人的诗文集。作者之所以用“丛书”命名，意在自谦，表示自己的作品丛杂细碎，无甚可观。

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丛书，始于南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俞鼎孙、俞经合编的《儒学警悟》。编者将六种记载宋代制度掌故和人物琐事的著作汇编为一部书，由此而开创了后世综合性丛书的体制。但其书只以抄本流传，并未刊刻。此后，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左圭辑《百川学海》，收书100种，不仅奠定了综合性丛书的规模，而且雕版印刷，成为第一部刊刻发行的丛书。自此而后，丛书的编纂刊刻开始流行起来。

《四库全书》的编纂是在18世纪清王朝统治的鼎盛时期进行的。当时的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明末清初时期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以朴实考经证史为方法的实学思潮，在学术本身内在的逻辑发展和清统治者推行的文化政策的作用下，逐渐演变成汉学复兴乃至鼎盛的局面。学者普遍强调通经，重视实证，致力于汉代经说的发掘和研究，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扩展到对古代典籍以及传统文化的清理和总结。与此相应，典籍的保存和整理，自然而然地成为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康熙年间（1662—1722），丛书的刊刻已成一时风尚，出现了曹溶《学海类编》、张伯行《正谊堂全书》、纳兰性德《通志堂经解》、张潮《昭代丛书》等一批丛书。乾隆初年，周永年进而推阐明末学者曹学佺“儒藏”之说，称此为“艺林中第一要事”，提出“目下宜先聚书籍，分局编辑，目录既定，易购之书则购之，或秘本不甚流传者则先为活板印之”^①，逐步建立“儒藏”，以保存书籍，提供学者研究利用。

在学术界重视搜求典籍，倡导建立“儒藏”的同时，清统治者为了标榜文治，充实天禄石渠之储，也多次下诏访求典籍，编纂图书。乾隆帝继位后，更大力提倡“稽古右文”，先后于六年（1741）、十五年两次诏令征书。三十七年正月，又第三次下诏征书，并明确规定了访书的标准范围和具体的采集方法。当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就征书的有关问题上奏朝廷，提出了搜访校录书籍的四条建议：其一，“旧本抄本，尤当急搜也”；其二，“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也”；其三，“著录校讎，当并重也”；其四，“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

① [清]周永年《儒藏说·与孔荪谷》，收入《松邻丛书·甲编》，仁和吴氏双照楼1918年刊本。

录也”。在第二条中，朱筠特别指出，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一书，虽“编次少伦，或分割诸书，以从其类；然古书之全，而世不恒觐者辄具在焉”，“请敕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①。

但是，朱筠的建议却在朝廷大臣中引起了不同的看法。反对者认为所奏“非政之要，而徒为烦”^②，主张弃置不议；赞成者则认为其建议很有学术价值，主张立即实行。经过激烈的争论，赞成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乾隆帝下令将《永乐大典》“详加别择校勘”，“择其醇备者付梓流传，余亦录存汇辑，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统按经史子集编定目录，命为《四库全书》，俾古今图籍荟萃无遗，永昭艺林盛轨”^③。这样，一道普通的征书谕旨，便因缘际会，引发出项大规模文化工程的开展，乾隆帝原计划进行的征书活动也一变而为编纂大型丛书的举措。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库全书正式开馆。馆中最高职务为总裁、副总裁，他们大都由皇室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其下根据工作性质的不同，大致可分为纂修、缮书、监造三大处。纂修处专职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司缮书处书籍的分校工作。设总阅官，总理书籍的审阅工作；总纂官，负责“各书详检确核，撮举大纲，编纂总目”事宜；总校官，总管全部书籍的校订工作；翰林院提调官、武英殿提调官，分别负责提取两处书籍事宜；总目协勘官，协助编定总目。至于具体纂修各书事宜，则分属于各纂修官，包括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黄签考证纂修官、天文算学纂修兼分校官等，他们在负责纂修的同时，大部分还兼任校勘。缮书处则专司全书的缮写和校勘事宜，设总校官，总理全部书籍的缮写校勘事宜；分校官，具体负责校勘一般书籍；篆隶分校官和绘图分校官，分别负责校勘某些专门书籍；督催官，掌管督责缮写校勘事宜；又翰林院、缮书处、武英殿收掌官，分别负责三处书籍的收发出入。至于监造处，则主要经管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设监造官专司其职。据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馆开列的任事诸臣衔名，各项专职人员达360人之多，如果再加上那些由于身故、升转、调任、告退、回籍，乃至被革职、解任等各种原因在馆时间不长而未能列名的人员，四库全书馆的专职人



① [清]朱筠《笥河文集》卷1，《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收入王重民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国立北平图书馆1934年排印本。

② [清]姚鼐《惜抱轩全集·文集》卷10，《朱竹君先生传》，中国书店1991年影印本。

③ 王重民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谕。



员当在400人以上。

在这个庞大的纂修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学有专长、名重一时的文人学者。总纂官三人为纪昀、陆锡熊、孙士毅，其他有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翁方纲、程晋芳、任大椿、姚鼐、朱筠、金榜、王念孙、陈际新、谢墉、赵怀玉等，堪称“贤俊蔚兴，人文郁茂，鸿才硕学，肩比踵接”^①。他们荟萃一堂，各以其学识专长，在不同的职任上，为《四库全书》的编纂做出了重要贡献。

具体而言，《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主要分为三大部分。

1. 《永乐大典》的辑佚

从《永乐大典》中搜辑佚书，是四库全书馆最早进行的一项工作。《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敕撰的一部大类书，计22877卷，另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全书以《洪武正韵》为纲，“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举凡“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以至奇闻异见，庾词逸事”^②，无不详载备录，因此号称“遗编渊海”。为保证辑佚工作的顺利进行，乾隆帝亲自规定了采辑标准：“其书足资启牖后学，广益多闻”，又“实在流传已少，尚可裒缀成编者”，辑出“汇付劄劄”；“有书无可采，而其名未可尽没者，只须注出简明略节，以佐流传考订之用”；至于“本系现在通行及虽属古书而词意无关典要者”，则“不必再行采录”^③。根据乾隆帝的旨意，总裁很快拟定了办理章程，将当时尚存的9800余册《大典》分派到各纂修官名下，规定每天应阅册数，以计日程功，考核督催。纂修官则各司其职，逐一检阅，并与《古今图书集成》互为校核，凡有符合采辑标准的书籍条目，即粘签标识，送交缮书处“迅速缮写底本”。底本缮成后，又对照原书，详细校正，再“将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详悉考证，论疏崖略，列写简端”，然后呈送总裁。总裁“复加勘定，分别应刊、应抄、应删三项，其应刊、应抄各本均于勘定后即赶缮正本进呈”，至于“应删者亦存其书名，节叙删汰之故，附各部总目后”^④。经众多学者长达数年的辛勤努力，总计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经史子集各类图书达385种，蔚为大观。其中最著名的有戴震经手辑出的《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合称《算经五书》，还有邵晋涵经手辑出的《旧五代史》等史书，周永年经手辑出的《公是集》、《公非集》等宋人文集。这些珍贵典籍的亡而复存，佚

①〔清〕阮元《研经室集·三集》卷5，《纪文达公集序》，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②《永乐大典》卷首，《凡例》。

③《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圣谕》。

④王重民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十一日办理四库全书处奏折。



而重现，充分体现了当时学者的辑佚成就和学术水平，也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和高度评价。

2. 内府书籍的办理

清宫内廷各处如武英殿、懋勤殿、摘藻堂、味腴书屋等地，都收藏有不少前代流传旧书，以及本朝皇帝敕令纂修的书籍。《四库全书》开馆后，这些内府藏书也都集中到翰林院，由总裁指定纂修官专职办理。由于这些书籍或经官刻，或属敕撰，因而大多直接送交缮书处缮写，少数“旧刻显然讹误”，或因种种原因需改纂增补者，则由纂修官予以校阅或酌情修改。如《大清一统志》，初纂成于乾隆八年，此后，清王朝陆续平定了准噶尔部以及天山南路大小和卓的割据，“开屯列戍，益广幅员”，原书已无法反映清王朝疆域的实际情况。四库馆臣便根据乾隆二十年的重修本，再加补订，“搜罗弥博”，“体例加详”，使“九州之砥属，八极之会同，皆可得诸指掌间”^①。与《永乐大典》的爬梳辑校工作相比，内府书籍的办理比较偏重于改纂增补，其后又奉乾隆帝的谕旨转入各种书籍的纂修，一直持续到乾隆末年。

3. 进呈书籍的校阅

进呈书籍主要指各省督抚的采进本和各地藏书家的进献本，也包括从社会上采购而来的通行本。据档案记载，在四库全书开馆前后进行的大规模征书活动中，全国各地搜访进呈的图书总数达到一万三千五百余种。由于这类书籍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因而纂修工作相应说来也最为繁杂。

其一，甄别。即对各省进呈和私人进献的万余种书籍进行全面的清理别择，上自“罕见之书”，下至“寻常著述”，均列入校阅单内，以供进一步校阅考核，斟酌去取。至于琐屑无当，“倚声填调之作”，或“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则摒弃不取。若发现有“颠倒是非”、“违碍悖逆”的书籍，也逐一剔出，有的甚至被划入禁书范围，遭到销毁或改易的厄运。

其二，校阅。进呈书籍经过初步的清理甄别之后，总裁即根据校阅单分别发下，由纂修官进一步做详细的考订校阅。校阅工作大致包括版本鉴别、真伪辨订、内容考证、文字校勘等重要内容。一般说来，在版本选择方面，“诸书刊写之本不一，谨择其善本录之；增删之本亦不一，谨择其足本录之”^②。对前代流传书籍的真伪，纂修官也根据自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68，《大清一统志》提要。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



己的学识和水平，尽可能进行认真细致的考辨，“大抵灼为原帙者，则题曰某代某人撰；灼为贗造者，则题曰旧本题某代某人撰”，若“有本属伪书，流传已久，或掇拾残剩，真贗相参，历代词人已引为故实，未可概为捐弃，则姑录存而辨别之”^①，力求正本清源，弄清传世书籍的真实面目。至于内容文字方面的考证校勘，则是纂修官做得最多的一项工作。他们或广泛参校不同版本，择善而从；或依据本书前后行文体例，考其歧异；或勘之《永乐大典》，订讹补阙。在他们的辛勤劳动下，有些长期以来“绝无善本”之书，一旦“神明焕然，顿还旧观”^②，成为绝无他本可以代替的珍本。

其三，提要。书籍经过甄别、校阅之后，纂修官的最后一项任务，便是给它们各撰一篇提要，叙列作者爵里，记述版本源流，撮举典籍要旨，考订文字得失，并根据乾隆帝制定的标准，提出应刊、应抄、应存的建议。大体说来，凡“实在流传已少，其书足资启牖后学、广益多闻者”当刊^③；“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④，以及阐明学术，长短互见，“瑕瑜不掩”者应抄；至于那些“言非立训，义或违经”，以及“寻常著述，未越群流”等所谓“俚浅讹谬”者^⑤，则存其目。若进而发现有粗疏不经，或“违碍触悖”的书籍，也略记数语，提出不应存目或销毁的建议，一并进呈总裁审核校阅，斟酌去取。最后再“进呈御览”，由乾隆帝予以定夺。凡应刊、应抄之书，均交缮书处组织专人按规定格式予以抄录，收入《四库全书》。其中应刊之书除缮写外，还专门送交清内府刻书机构武英殿，列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广为刊刻流传。至于应存之书，则不再抄录，只将书目提要列入《四库全书总目》。

经过长达九年的辛勤工作和艰苦努力，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第一部《四部全书》告成，贮藏宫中文渊阁。为“广布流传，以光文治”^⑥，乾隆帝下令，除原定将《四库全书》缮写四部，分别贮藏宫中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盛京（今沈阳）故宫文溯阁之外，再增缮三部，颁发江浙“人文之区”，分别度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这样，继第一部《四库全书》告成之后，至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第二、三、四部《四库全书》相继办理完竣。续缮三部《四库全书》，也于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同时告竣。乾隆五十年，内廷文渊、文源、文溯、文津四阁《四库全书》先后装潢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69，《水经注》提要。

③ 王重民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谕。

④ 王重民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四日谕。

⑤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



送藏完毕。此后，江浙文汇、文宗、文澜三阁《四库全书》的装潢置事宜也陆续完成。一时之间，内府藏书臻于极盛，插架之供不啻千缙万帙，而江浙三阁《四库全书》，也因特许士子入阁抄阅，所以很快成为事实上的图书集聚传播中心，不仅起到了“嘉惠艺林，启牖后学”的作用，而且大大促进了清代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适应清理编次历代典籍，总结评判传统学术的需要，《四库全书总目》应运而生。这部大型官修书目既是《四库全书》的目录和总纲，同时又是中国目录学乃至文化史上的重要著作。它继承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总结自汉刘向、班固以来历代目录著作的得失利弊，以比较完善的分类体系，提要、小序俱全的著录方式，详晰介绍、评鹭了《四库全书》著录、存目的各种书籍，系统考查、总结了学术的渊远流变，不仅在目录学上取得了可观的成就，而且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的篇章。

一、详晰的书目提要

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校书工作，创立了中国目录学史上书籍著录“条其篇目，撮其指意”的方式。自此而后，历代学者大多踵而继之，不少官撰、私著各种目录，如唐元行冲《群书四部录》，宋王尧臣《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都十分注意介绍著者生平，撮述内容大旨，考订学术源流。一些史志目录，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也采用注释的方法，释疑解惑，揭示图书内容。这种有篇目、有提要或注解的著录方式，成为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主流。特别是宋代以后，随着图书版刻事业的发展，一些私家目录，如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还开始兼载版本及其有关资料，使书籍著录的内容更为丰富。但在目录学长期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些学者摒弃解题，认为“泛释无义”，不足为取；还有一些目录著作只载书名、卷数、撰人，成了仅仅“部次甲乙”的流水帐簿。延至明代，流弊更甚，官修《文渊阁书目》，专载明内府藏书，“以千字文排次，自天字至往字，凡得二十号，五十橱”。然而，其编录不仅不能“考订撰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八日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次”，反而于“所载书多不著撰人姓氏，又有册数而无卷数，惟略记若干部为一橱，若干橱为一号而已”^①，成为历史上最草率塞责的官修目录，遭到后世学者的一致批评。《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者总结历代目录著作的经验教训，选择了传统目录学注重“条其篇目，撮其指意”的著录方式，明确规定了提要的撰写体例：“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②并在统一的体例之下，因书而异，突出重点，或辨作者真伪，或述篇章体例，或考文字得失，或论内容大旨，或叙版本源流，使读者对《四库全书》著录、存目的各部书籍，都能有一个既完整清晰，又主次分明的理解，较好地起到了目录著作提要钩玄，指示门径的作用。

二、严密的分类体系

书籍的分类编次，是学术发展变化的重要标志。早在汉代官府进行的校书编目工作中，刘向等学者就曾根据书籍的内容及学术性质，把当时全部图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类，开创了我国目录学史上图书系统分类的先例。此后，随着学术的发展，又陆续出现了四分法、五分法、七分法。而由魏郑默《中经簿》、晋荀勖《中经新簿》创立，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调整，至《隋书经籍志》正式确立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因其适应了学术发展的情形和统治阶级的需要，遂被奉为正统分类体系，为历代绝大多数目录著作所承袭。《四库全书总目》在分析《汉志》以后各种分类法得失利弊，考查前代目录著作图书归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比较严密、完善的分类体系，即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于部下分类，类下再分子目，计4部44类66子目。其中虽大多沿袭前人，但却能折衷诸家，自出新意，无论在类目的设置归并，还是在书籍的具体隶属方面，都有一定的改进和创新。

其一，折衷诸家，酌情设立图书类目。自《隋书经籍志》确立四部分类体系之后，历代目录著作大多相沿不改。但随着学术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化，图书细类的划分却不断有所增并改变。《四库全书总目》十分注意吸取诸家长处，斟酌确定图书类目。如经部“四书”一类，自朱熹分别为《论语》、《孟子》二书作《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又抽出《礼记》中《大学》、《中庸》二篇，作《大学章句》、《中庸章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85，《文渊阁书目》提要。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